

出城进城：寻找党

□ 门晓红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岁月里，党就是指引革命道路的灯塔，无数进步青年都追寻着她。70多年前东北解放前夕，我的父亲门枢曾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坐着狗拉爬犁寻找党组织，几经波折，他们找到了党，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11月，父亲进入长春大学读书。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国民党正疯狂逮捕镇压进步同学，不准同学们阅读进步书籍等等。这一切使同学们更加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1947年12月初，我父亲和他的同学张智、汪静岳、王哲、刘信潮一行五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了一道道国民党封锁线，离开长春，踏上了追求革命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同学们从长春往北，先到了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找到了当地的民运科长江含，得知同学们参加革命的愿望后，江含力劝同学们回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春为党从事地下工作，为早日解放长春作准备。当时同学们参加革命的决心很大，千辛万苦从长春走出来，不想回去。江含看同学们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就给同学们带上一些东北的流通券（当时的一种货币），让同学们继续北上。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长春是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又位于松辽平原中心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久困长围”的办法攻打长春，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工作瓦解敌军，使敌人内外交困，军心浮动，失去战斗力。

当时火车已经不通了，同学们坐上狗拉爬犁，顶风冒雪，在冰天雪地里一路向北。12月3日越过松花江到达江北

的五棵树镇，找到了那里的党组织，一位叫张吉平的同志接待了他们。张吉平反复给同学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恳切动员同学们回到长春为党做地下工作。他说：“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革命岗位就在长春，你们回去人地两熟，比我们派人去强多了！”尽管同学们都热切地期望加入解放军队伍到前线去，但还是被说服了，既然回去能为革命发挥更好的作用，同学们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同意返回长春，为解放长春出力。张吉平帮助同学们制定了回到长春的工作内容，还给同学们确定了组织的名称。同学们按照要求填了表，写好简历，履行了参加革命的手续，最后张吉平和同学们拍了纪念照。

12月8日，我父亲和同学们一起回到了长春，秘密地住进了长春大学的宿舍里，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第一，办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俄语，交流阅读进步书籍的体会。第二，团结思想进步的同学，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吸收到组织里来。第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1948年初，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派李天成到长春工作，他得知长春大学有一些进步青年在为党工作，就主动联系同学们。同学们加入到李天成领导的革命小组中，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对敌斗争。

同学们把“告长春市民书”“告国民党官兵书”“告国民党警、宪、特人员书”等传单散发到机关、学校、军营中。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大学校园里不少人读到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宣传小册子。

为了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影响，同学们动手创办油印刊物《前夕》等，自己当编辑、写文章。办油印刊物需要油印机，同学们没有钱，买不起。我父亲就求助当时在长春市兴安大路开西药房的表姐夫，他为人厚厚，对共产党有好感，帮同学们买到一台油印机，解决了燃眉之急。同学们办的油印刊物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1948年5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率领人民解放军包围长春。长春城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解放军，为迎接长春的解放做了大量群众工作。最终迫使国民党十多万守军走投无路，向解放军投诚，最终迎来了和平解放长春。

1948年8月，长春解放前夕，围城的东北野战军独立九师需要擅长写作，有文字水平的干部，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解放军，一路南下，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3年父亲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为国家奉献了青春热血。自从走上革命道路，他坚定地跟着党走的信仰就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部教授】

红色记忆



中国经济为何能乘风破浪

□ 邹一南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经历过高速增长和繁荣。但其中很多国家在遭到一次经济危机冲击后就一蹶不振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全世界的移民和资本都向这里汇聚。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重创了阿根廷经济，同时也拉开了这个国家百年衰退史的序幕。苏联，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也创造过工业化的奇迹，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它就陷入了停滞，之后再也不能复苏，直到走向解体。亚洲经济强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就进入长期的停滞，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遭遇危机冲击的时期。每当此时，西方就会兴起一次所谓“中国崩溃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崩溃论”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时的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中国也正在经历体制转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混乱。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崩溃的社会主义国家。物价上涨，商品短缺确实是那个时期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事实上，从那之后不久，中国就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改变了通胀和物资短缺的局面。现在，人们的实际工资已经远远高出20世纪90

年代初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第二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期间。这场横扫东亚的金融危机让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倒下。而当时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将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终结经济增长的奇迹。在世纪之交的那个年代，对货币贬值、财富缩水的担忧的确曾萦绕在国人心中，但转机也很快到来：中国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在几年之后开启了一段高速增长黄金期，货币没有贬值、财富也没有缩水，城乡居民人均存款从当年的3700多元逐步上升到了2020年的6.4万元。事实再一次让“中国崩溃论”崩溃。

第三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退波及高度外向型的中国经济，沿海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西方学者再次预言，中国将像阿拉伯世界一样爆发一场“茉莉花革命”，并走向全面崩溃。就业难是每次经济危机的伴生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不过，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都迅速返回了工作岗位或找到了工作。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中流砥柱。

回顾历史，环视世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经济无论遭遇多大

的危机都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让“中国崩溃论”屡屡破产？

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能够一次次化解危机的冲击，首先源于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GDP增速从一年多前的14.2%大幅下降到6.2%。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宏观政策，第一时间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不到一年时间就恢复了9%以上的增长。这期间，国有企业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中央投资有很大一部分布局到农村，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也为2000多万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创造了就业岗位。同样是发生大规模失业，在有些国家就会酿成严重社会危机，而在中国，相当于中等国家人口数量的失业却被静悄悄地消化了，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与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相联系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社会和人民强大的政治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久，202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六保”的决策部署：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试想，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能够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作出如此全面的兜底承诺？

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的人们，怎么会没有对未来坚定的信心呢？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

成功法宝——“自我纠错机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纠错，从而加深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提升治理能力的历史。早在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就是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灵活调整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曾经犯下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对错误的纠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党中央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当90年代体制转轨面临困境时，党中央又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入21世纪后，当内需不足成为发展瓶颈的时候，党中央坚定地扩大开放，借助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党中央果断地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推动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再一次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我们党的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在未来的百年航程上，无论遇到多少风险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驾护航，中国经济巨轮必将继续向着梦想的彼岸奋勇前进，乘风破浪！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下一讲主题：

《中国如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主讲人：赵 磊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伟大创举。她滥觞于春秋争战之际，奠基于隋代一统之初，繁盛于唐宋迭代之间，成型于元代定都大都之后，泽被于明清承平之时，承载了南北交通、东西交汇、中外交流的重大使命，孕育了星罗棋布、灿若星河的名城古镇，凝结了码头、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工智慧，造就了衙署、钞关、粮仓、庙宇等历史遗迹，也积淀了开拓进取、兼收并蓄、厚生利用、守正创新的人文精神，蕴藏着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的基因。

扬州因“运”而生，应“运”而兴。2500多年来，扬州与大运河同生共长、神会心契。大运河的最早开凿始于这里，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沟通江淮，邗沟成为中国境内最早有确切年代记载的人工运河。大运河的全局肇画起于这里，隋炀帝大业元年，在开挖通济渠的同时，“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今扬州仪征）入江”，成就了“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的伟大工程。大运河的最初定名源于这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记载的“运河”就已成为这一人工水道的专名。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成立，扬州牵头与沿线8省市35座城市一起联合推动申遗，大运河于2014年6月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扬州和大运河命运与共的悠远历史、城河互动的密切关系，又使得扬



悠悠大运河 千年话扬州

□ 李立峰 马俊

州的城市文化鲜明而独特。扬州这座城市不绝如缕的绚烂篇章，正是叠印在大运河写就的宏伟史诗上，沉淀并折射出了我们民族古老而又永恒的精神品质。

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执着信念。钱穆先生评价道：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兴衰，可以观国运。扬州兴盛于汉、鼎盛于唐、繁盛于清的背后，总是映衬于国家统一、疆域广阔、经贸频繁、文化交融的恢宏底色。没有西汉初年的政局重建，就没有吴王刘濞开通运盐河、增筑广陵城，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廛用朴地，歌吹沸天……才力雄富，士马精妍”的全盛之时；没有杨隋一朝的终结乱世、国家一统，就没有大运河连通黄河、淮河、长江，促进三大流域经济、文化互动共兴的空前盛况，就没有唐代“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天

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的历史盛名；没有元初迁都大都、定鼎中原的文治武功，也就没有上至北京、下抵杭州、五大水系一脉贯通的京杭大运河，更不会有清代扬州集齐漕运、盐业、河务三大要政，“春留歌吹江城艳，天富鱼盐海国丰”的盛世华章。

砥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历史上扬州屡经战火，但是每一次灾难以后，扬州都迅速地迎来了奇迹般的浴火重生，并且愈加繁荣。这都深深源于这座城市果敢勇决的顽强气质、茹苦含辛的进取意志。清代学者汪中在《广陵对》中的慷慨陈言：“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畝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一旦有变，进则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则保据州土，力图兴复”，体现了根植于地域发

展之上的自强品格。扬州之盛并不止于货殖，古扬州每年以本地农人辛苦劳作出产的黄糙米、乌芥米和莞席、细纻为贡物定制，此外更有造船、制盐、铸钱等百业竞生。

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扬州学派崇实黜虚、守正创新、触类旁通的鲜明特质，正是扬州文化特质的传神写照。“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历史上的扬州沿运溯淮、通江达海，因开放而交融、因兼收而出新。文学上的北风南骚、戏曲上的北刚南柔、建筑上的北雄南秀，饮食上的北面南米、北浓南淡……随运河汇流于此，交融新变出“清、精、雅、健”的扬州工艺，“出、入、和、合”的维扬风味，远“借”白塔、近“移”金山的瘦西湖湖上园林……而这些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扬州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的本色及其

海纳百川的胸怀。《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城内“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孔尚仁盛赞“广陵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的有才之士集聚扬州，襄助了扬州文化的昌明、城市的繁荣，也印证着文化是发展的摇篮，发展动力存在于文化的土壤之中。

涵养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扬州之得名，一说源于“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大运河扬州段的生成流变，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布局和街巷的形制。伴随着长江岸线的南移和运河水道的变迁，扬州城址自北向南拓展，运河也从蜀冈之下的城外水道一变而为运河绕城、官河纵贯、支河密布的水系，“车马少于船”“邻里漾船过”“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不胜枚举的唐诗佳句传神地勾

勒出扬州河城一体、水城共生的独特格局，也细致地传达出城市水绿相依、天人相谐的秀美风貌。扬州对于滨水园林的匠心构建也突出反映了其依水建城的人居哲学。从南朝徐湛之于城北陂泽“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到隋炀帝在扬子津建临江宫凝晖殿，再到清康熙时“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重复”的临河起园；从南宋时期于郡圃修建的“濠想”“剡兴”二亭，到明代郑侠如的休园以池水“伏行”“溪行”寓“淡泊水乡之趣”，再到清代二分明月楼“旱园水作”的引水入园，前人塑造了扬州城园一体的风貌，糅合了建筑、文学、书画为风骨，更升华了扬州清新自然、恬淡冲和的精神旨归，颇与诗意栖居契合。

时移世易，舟车百货、波通万里的大运河作为经济之河、文化之河、生态之河的时代价值更加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第一城扬州更需切实肩负“让古运河重生”之责，在继承弘扬运河人文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磅礴动力，让千年大运河这张国家文化名片更加熠熠生辉！

